

研究新的标准, 正确评价三线军工企业

赵 锡 斌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

1964年8月初, 美国在越南制造了北部湾事件, 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 同年, 我们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与苏联的关系白热化。当时, 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 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从原拟主要解决“吃、穿、用”问题, 改为“要准备打仗”的计划。于是, 自“三五”计划以来, 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到“五五”时期, 共投资约2,000亿元, 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研究机构, 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 技术、人才、设备比较先进的战略后方基地。尤其是国防工业, 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地带。

但是, 由于当时急如星火地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 加之受极“左”错误思想的干扰, 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建在远离城市, 远离交通枢纽的深山老林之中。因此, 三线企业, 特别是三线军工企业的作用, 一直受到了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难以很好地发挥。近些年来, 又由于我们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 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的轨道, 军费开支大幅度压缩, 军品研制与生产任务急剧下降。于是, 三线军工企业的处境更每况愈下, “生活”艰难竭蹶。大多军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 无米下锅。因此, 三线军工企业的形象在某些同志眼里, 已一落千丈, 连军工企业的同志也自愧不如, 昔日的“自豪感”、“光荣感”无影无踪。

更为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中, 对三线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也存在着绝然对立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 三线军工企业是个宝, 应加快调整改造的步伐, 使之充分发挥优势与潜力, 为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而有的同志则认为, 三线军工企业是个大包袱, 过去没有起积极作用, 将来其作用也难以发挥, 因此, 不大重视与支持其调整改造。这种认识上的尖锐对立, 如不加以解决, 势必影响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改造步伐, 影响我国四化建设的进程。

二、“包袱”说的源头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反差强烈的对立观? 究其根源, 我认为主要发生在对三线军工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标准上。

我国目前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有: 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百元产值实现的利税、资金利税率、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等。它对评价一般民用工业企业以及某一地区的工业经济效益, 促进企业和地

区加强与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样用这几项指标,来评价三线军工企业,就必然会产生认识上的问题。以1985湖北省国防工业与全省工业对比为例,国防工业人平占有固定资产净值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94%,固定资产新度(即净值占原值的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56%,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07.75%。这说明,国防工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质与量都比全省平均水平高。但是,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却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百元产值实现的利税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7.23%,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4.81%,全员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4.11%,百元产值实现的利税只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1.58%,资金利税率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0.78%,而百元产值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则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202.36%。呈现出“三高一低”的反向发展状况。即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高、固定资产新度高、流动资金占用高、经济效益低。另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一五”计划以来,工业的投入产出率(即单位投资创造的产值),沿海为0.937,而三线企业仅为0.259。

由此必然作出如下结论:目前我国三线军工企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不能实现有效的结合,是多投入少产出,或只投入不产出的典型,对人、才、物资源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因此是个“包袱”,拖了四化建设的后腿。

三、一把不公平的尺子

用上述标准评价三线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以此来认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没有考虑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作用与特殊环境等因素。

首先,上述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是根据一般民用工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并没有考虑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性。例如,一般民用工业,其生产成果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因而生产批量较大,一般体现了“短、平、快”的特点。无论从实物形态还是从价值形态上看,一般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三线军工企业则不同,某些国防军事科研项目,其任务主要是研制、试生产,或单件、少量生产,并不需要形成批量,也不直接面对市场。但要保证项目的研制成功,又要求有齐全的高精尖设备、先进的技术、高水平的人才,缺一不可。即人财物高度密集。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三线军工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必然较低。如有些检测手段,有些环境模拟实验室,均花费了巨额投资,却很少使用。因此,从实物形态上看,往往是多投入少产出;从价值形态上看,也可能是只投入不产出。例如,某些战略或战术武器的研制,国家拨给了大量经费,而研制成功后,其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不可能也不必要继续批量生产,这样,从价值形态上考查,其经济效益可能为零,而从长远的战略上考虑,它又带有“练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性质。

其次,三线军工企业有着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它担负着巩固国防,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的艰巨任务。例如,原子弹的爆炸、不同类型的卫星上天,运载火箭的发射,以及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等等,三线军工企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巩固国防,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保证我国在和平的环境里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又起着推动四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例如航空工业部609所,将飞机环境控制系统的涡轮膨胀制冷技术和换热技术,应用于石油工业,研制了油田气液化回收装置,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而且给石油工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受到了赵紫阳总理的充分肯定。

三线军工企业的这些作用,如果单用以上经济效益指标衡量,可能效益很低,或效益为零,甚至是负数,但从综合效益看,则是一般民用工业企业无可比拟的。而对这些重要的“效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

再次,三线军工企业的建设,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大都在偏僻的山沟,钻山进洞太深,“与世隔绝”,简直成了一个个部落。因此,工厂办社会比一般民用工业更为突出,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各级各类学校;从医院、商店到各种福利设施;从电影院、电视转播台到各种文娱活动场所。总之,如三线军工企业的同志所讲:“除火葬厂、监狱外,什么都要办”。一切都得自给自足。因此,从事社会服务事业的人员多,生产工人少。这势必增大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经济效益。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分担了国家或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减少了国家的开支。从宏观效益讲,是对国家的一个贡献。

很明显,完全用我国现行的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三线军工企业,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它抽掉了三线军工企业的特殊贡献和特定环境,或者说舍其长,就其短,避其实,击其虚。

四、用系统的观点评价三线军工企业

当代的社会经济是多维、多变量、多层次、多功能、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系统,有着十分复杂的交叉效应。对三线军工企业,简单地用几项直接的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其在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肯定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因此,我们应以系统的观点,对三线军工企业进行科学的评价。

首先,三线军工企业,具有亦军亦民,军民结合的双重性质。它不仅要保证军品研制与生产,而且要面向社会,面向四化建设。不仅要适应市场需要,生产民用产品,而且还担负着巩固国防等等的艰巨任务。虽然军品生产也应逐步实行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原则,但这种任务本身,已远远超出了商品生产与交换本身的意义。这样的一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在评价三线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时,不仅要看直接的经济效益指标,而且要考虑其国防、社会等方面的间接“效益”。

其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军工企业是新的科学技术最集中的地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常常是首先应用于军事上。因此,军工企业担负着科技攻关、技术储备等使命。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应用于经济建设,将会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三线军工企业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也远远超出了其研制与生产某种产品本身的意义。在评价三线军工企业时,也应考虑其科技贡献的“效益”。

再次,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总的趋势是由东向西逐步推移。而三线军工企业,都是在我国的中部与西部交汇地带。一方面,它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示范与带动作用。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三线军工企业以人才、设备、技术的优势,对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东向西移,必将起着重要的中转、传递与推动作用。因此,三线军工企业,目前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与问题,但它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地位与作用,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由此看来,评价三线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用系统的观点、系统的方法,全面考虑。不仅要看微观经济效益,也要在宏观上考虑其综合效益。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制定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科技等直接

与间接效益,并根据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规定不同的权数,加权相加后求得综合指标值,综合评价三线军工企业与民用工业企业的比较效益,使我们对三线军工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五、以直接经济效益为主,间接效益为次

我们提出以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结合的综合效益来评价三线军工企业,决不能认为由此就忽视甚至否定对三线军工企业进行直接经济效益的评价。也就是说,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所谓“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应以直接经济效益为主,间接效益为次,来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其理由是:

首先,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军工企业也不例外,也要树立价值观念、时间观念和经济效益观念,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

其次,从目前情况看,撇开间接效益不谈,三线军工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在三线军工企业内部,各部门的经济效益是极不平衡的。如在湖北省的国防工业中,有的部门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已接近和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而有的部门的经济效益却极低,一些重要效益指标,与先进的部门相比,相差2—20倍以上。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调查的情况表明,除各部门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困难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部门、各企业,在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军民结合的程度与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有的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与装备优势,根据市场需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研制与生产出工艺相近、技术相通、结构相似的民用产品,使生产任务饱满,经济效益很高,不仅上交国家利税多,而且企业留利增加,生活条件与环境得到了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与此相反,有的企业,虽然有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先进的设备,由于还不适应军民结合的形势,更不适应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要求。或者看不到自己的优势,长期形不成支柱民品;或者是尾随消费,产品货不对路,积压亏损;或者是经营管理不善,成本高、质量差,效益更差。因此,出现人才、设备大量闲置。有的企业先进的通用设备,利用率还不到10%,许多技术人员为无活干而发愁,有劲没处使。这当然会严重影响经济效益。如果三线军工企业都能尽快适应改革的新形势,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加强经营管理,生产出军民互通、工艺相近、结构相似、符合市场需要的支柱民品,并增强吸引力与辐射力,就能在提高间接效益的同时,大大提高直接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在采取综合效益评价时,必须以直接经济效益为主,以促进三线军工企业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可否进一步设想,综合指标体系由主要指标(标准)和次要指标(标准)两部分组成,其综合指标值为100。其中,主要指标由目前已在实行的若干直接经济效益指标组成,其指标值在整个综合指标值中占绝大比重(比如80%);次要指标由国防、科技、社会等大类指标和若干具体指标组成,其指标值在整个综合指标值中占较小的比重(比如20%);各类中的各种具体指标均相应地规定其指标值。如果各具体指标均得满分,那么,其综合指标值为100,即效益最佳;如果主要指标值均得满分,次要指标值为零,那么,其综合指标值为80,即效益良好;如果主要指标值只得60,而次要指标值得满分,其综合指标值也是80,亦即效益良好。如此类推。运用这种方法评价企业,我认为无论是对民用工业企业还是对三线军工企业,都是公平合理的。它可以把每一企业放在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系统之中,进行全面考查,有利于不同企业在公平的标准下开展竞争,正确地评价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